

收稿日期:2023-10-20

抗战时期新四军参谋地位确立的历史考察

轩艳青

(安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要:新四军参谋地位的确立,是新四军参谋制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新四军正规化的主要表现。在新四军组建初期,参谋地位低、业务能力差,既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也与新四军参谋制度不完善有关。为了改变参谋的处境,发挥参谋的作用,新四军采取了提高全军关于参谋重要性的思想认知、加强参谋的思想文化教育、提高参谋的政治地位等措施,逐渐拓展了参谋的职权范围,使参谋成为军队的“全能手”,最终确立参谋“大管家”的地位。参谋成为首长的“伙伴”和“代理人”,提高了参谋的政治地位,推动了新四军参谋工作的顺利开展,推动了新四军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提高了新四军的生存能力。

关键词:新四军;参谋制度;参谋地位;赖传珠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1-0043-07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中共在皖中地区的抗日民众武装工作”(SK2020A0032)。

作者简介:轩艳青(1988—),男,河南睢县人,安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新四军研究及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1.006

目前,学界关于新四军参谋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肖晓飞^[1]从参谋工作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新四军参谋工作的业务、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成效,但是,“与此前研究国民党军参谋机构的框架大体类似,没有凸显中共特点,稍有缺憾”^[2]。叶铭^[2]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央军委参谋部门的机构和职责以及与新四军司令部的业务关系。此外,还有一些梳理性的文章,这些文章都缺少对新四军参谋地位变化过程的梳理和研究。本文结合新四军文献、相关人物的军事文集、日记等史料,考察新四军参谋地位变化的历史过程,以及它在新四军参谋制度完善和部队正规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新四军组建初期参谋的地位概况(1937年10月至1941年1月)

1937年10月,新四军的组织形式“全部采用国民党编制,下辖参谋、秘书、副官、军需、军医、军法六大处,参谋长下辖作战、侦察、通讯三科”^{[3]575}。在此之前,“由于游击作战的特殊环境,南方各红军游击队没有正规的指挥机关,往往靠指挥员机断指挥”^[4]。因此,在新四军组建之前几

乎没有参谋工作可言，新四军组建之后参谋工作也是从零开始，又因照搬了国民党军的参谋制度，导致参谋工作问题重重。

在国民党军的参谋制度设计中，参谋处只是幕僚机构，“参谋长不负实际责任”^[5]。由于当时参谋人才非常缺乏，军令部又无法满足各部队的需要，“各部队长于是自行以金钱、阶级为手段罗致”，“参谋既为部队长所罗致，于是成为部队长私人的幕僚，多与部队长共去留、同进退”，指挥官“对于幕僚，视如军事秘书，仅盼其能起草命令、报告，绘制图表，有为军官多不屑为，甚至非军人也滥竽其间”^[6]。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把参谋看作是附属品的‘武秘书’，是由各带兵首脑包办的”^[7]。参谋人员在军中不仅未受到重视和尊重，而且地位低下，没有威信，处境非常尴尬。

新四军参谋人员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新四军成立初期，由于受当时游击环境以及国民党军参谋制度的影响，参谋人员职权较小，参谋工作“限于事务主义及技术上指导的狭小范围”^{[3]575}。而且，在新四军中普遍认为“参谋工作是辅助主官的幕僚、无兵无权不关重要的东西”^{[8]85}，并把参谋人员看作文书、收发、通讯员，“他对于整理训练军队、计划战斗的意见是不能多发表的”^[9]。因此，造成“下级没有把实际情形来贡献上级，上级也没有注意到下级的实际情形”^[10]。上下不通，参谋的作用无法发挥，导致参谋工作效率低下，地位逐渐下降，进而影响了参谋人员做参谋的热情，不愿从事参谋工作。他们认为：“当一个团参谋长不如当一个连长，当一个支队参谋长不如当一个营长。掌兵总好些，总是一个首长，参谋工作是无意识的。”^{[11]605}因此，他们“总想下部队带兵打仗，不安心在机关当参谋”^[12]。

参谋人员的尴尬处境，不仅制约了参谋工作的正常运转，而且还影响了新四军军队的正规化进程。1939年3月16日，毛泽东就参谋工作问题致电新四军领导人，要求“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地位与信仰”^[13]。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四军领导人在新四军成立之初，就开始探索参谋工作的建设方法。首先，参照“苏联红军野外教令”和军首长的指示以及联系军队的实际经验训练和培养参谋人才^{[8]84-85}。其次，在1938年6月和1939年3月相继召开了两次参谋工作会议，强调参谋工作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全军将士对参谋人员地位的思想认识，并通过了指导性文件《参谋工作条例》和《军事工作条例》。在此基础上，新四军为了提高参谋的地位，主要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地位。参谋地位低下的原因之一就是政治地位低，没有威信。为此，新四军明确了参谋与首长的关系，即“参谋长是首长的第一个代理人，他可以用首长的名义发出命令，就是说在首长总的企图下他有独立工作的权力”^{[8]87}。在行政上，“各级军政首长在会议上、命令上指出指挥机关的重要性和应有的地位”，以此提高军队对参谋重要性的思想认识。同时，赋予参谋长署名的权力。因为参谋长是“首长的第一代理人，署了名表示参谋长负责”^{[14]296-297}。参谋人员是首长“代理人”政治地位的确立和赋予署名的权力，有利于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地位和威望，促进参谋工作的正常化运转。1938年6月，新四军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就明确了参谋机关与政治机关的关系，即“二者不可缺一的，其相互关系如军事方面，政治部须受参谋机关指导，而政治方面，（司令部参谋机关）则受政治部领导”^{[8]85-87}。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能够“使军事得到政治的保证和政治的帮助”^{[14]192}。在新四军中，需要“参谋工作人员在不妨害本身工作条件下，尽可能地而且应该要参加政治工作”^{[14]297-303}。

二是逐渐扩大参谋的职权。参谋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应“请示首长，首长不在家时可自行负责处理”^{[8]88-89}。参谋与首长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参谋工作是首长工作的一种分工。二者职权关系的确定，使得参谋避免了成为“传话筒”，有助于提高参谋的政治地位。在军队指挥作战方面，“只提意见，由首长决定，但是经常工作和命令执行监督，参谋长应该有一定的职权”^{[11]605}。之后，参谋的职权扩大到可以“用首长名义发出号令，然后又去检查号令，必要时又可代表首长督

战、指挥部队”^{[14]297}。此外,参谋还有到部队巡查工作的权利。例如,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派“朱参谋去竹镇,检查特务营的工作,派郭参谋去七团检查工作”^{[15]230-232},等等。参谋人员到各个部队检查工作,有助于提高参谋的地位,改变军队轻视参谋的观念。在参谋业务上,“参谋处是整个部队的灵魂。不仅管作战而且还要管教育、通讯、侦察、联络,以及后方勤务”^{[14]190}。具体而言,参谋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首长的意图下,“组织指挥、管理、教育主力部队,但同时也要组织、指挥、教育地方武装,同时又要组织、管理、指挥、教育武装群众”^{[14]303-304}。

三是加强对参谋人员的培养和业务能力的提升。参谋只有“增强自己本身的能力,正确地解答问题和指导部队工作,这样才能够提高参谋工作的地位”^{[8]85}。新四军组建后,为了提高参谋人才的能力和素质,在叶挺的主持下成立了军部教导队,“从部队干部和抗日青年中挑选学员,加以培训”,“亲自指导参谋人员剖析各种战例,研究日军的战术特点,提高指挥能力”^[16]。学员从教导队结业以后,一般是“被分配到支队部参谋处工作”^[17]。为了加强对参谋人员的培养,周子昆“从教导队抽调学员举办参谋训练班,培养参谋人才”,并“派通信科长胡立教去武汉中央军校学习,派侦察科长谢忠良去湖南零陵工兵学校学习”^[18]。为了改善新四军参谋人才不足的局面,刘少奇于1939年11月请示中共中央派参谋训练班学生三十人来支援彭雪枫部的发展^[19]。之后,彭雪枫要求“各团各总部(队)应办教导队,各营应办短期训练班,做到处处都是训练班、教导队”^{[14]191},进而实现扩大参谋人员的规模、提升参谋业务能力的目的。

新四军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提高参谋的地位,但由于缺乏参谋人才、缺少参谋工作经验等原因,参谋人员的地位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1939年3月,新四军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之后,“对参工才有某些改变,仍限于技术上的改进,……对部队管理、部队训练、部队组织战斗的使命只表现暂时无能”^{[3]575}。参谋工作的滞后,参谋地位的低下,使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时常感到无力,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这份工作,“有些难过,似乎我这个参谋长只应管后方吧?使用太不适当了”^[20]。

二、新四军重组后参谋地位的逐步提升(1941年2月至1942年12月)

1941年1月,新四军在江苏盐城重建军部。新四军各部司令部改编,“按八路军总部颁发之司令部组织条例组成,开始注意参谋工作的建设”^{[8]575}。至此,新四军开始完全按照八路军的参谋制度进行改革。八路军的参谋工作继承了红军时期的参谋制度,有较为完善的司令部机构和明确的业务范围。从此,新四军参谋工作有了可参照的模板,各级司令部的编制与职权根据时局的需要进行调整。

1941年2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的《军政委员会条例》指出,“各级军政委员会,由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主要负责人组成之”^[21]。参谋长成为军政委员会中重要的一员,参谋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然而,在新四军参谋工作建设过程中,参谋人员地位低下、处境尴尬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参谋人员的自我轻视。有一部分参谋有不愿从事参谋工作的倾向,且“不安心工作,不能埋头苦干,把参谋工作当做单纯的技术工作和事务工作看待,轻视自己”^{[22]47}。他们认为自己无兵无权,“好像是御用的官僚工作,不甚重要,也无兴趣的”^[23]。而且,参谋职权的低下,影响了他们做参谋的热情,甚至有些参谋开始自暴自弃,“自以为没有‘带兵好’,做参谋的是不好的,于是就得过且过,不安心,要求学习或调动工作”^{[24]153}。有些参谋即使参加了抗大、党校举办的参谋训练班学习,结业之后“不愿回参谋处工作”^{[15]415}。

这一时期,影响参谋地位提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新四军参谋工作建设进度缓慢,参谋制度不完善。“司令部内各种工作制度的建立还不完善,人员编制也不充实,分工也不严密,某些工作的兼并合办,以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工作效力。”^{[25]255}例如,一师不仅没有健全的司令部

机构，“参谋长、参谋处长都没有，什么都是师长管”^{[26]182}。六师没有健全的参谋处，“参谋长师长兼”^{[26]725}。二是负责参谋工作的领导业务能力不足。如曾任新四军参谋长的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27]189}。而且，有些负责参谋工作的领导，对参谋机关的人员尊重不够，“因此影响我们参谋同志的工作，情绪不高”^{[26]725}。三是有些参谋人员嫌弃参谋地位，不愿从事参谋工作，“愿意在战前表示并不懦弱，愿意人家说他是英雄勇敢”^{[27]598}。四是任用参谋人员不慎重，“将犯了错误而无法分配工作者充数”^{[24]152}。参谋工作专业性强，要求参谋人员具备“军事经验，相当政治文化的素养，冷静聪明的头脑，坚强的胆识”^{[28]169}。将那些“犯错误的无法安置的人员放进司令机关来”^{[22]47}，由于他们思想觉悟比较低，存在错误的思想观念，又缺少正规的参谋教育，导致他们“不能称职工作，且不安心，又影响司令机关的威信”^{[28]167}。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提升参谋的地位，新四军“在全体指挥员中，进行认知参谋工作重要的教育”^{[8]210}，即“参谋工作是部队的灵魂”，“没有这一工作，军队就不会打胜仗；谁轻视这一工作，谁在军事建设上就一定失败”^{[28]184}。在教育上，增加参谋培养的教育机构，加强对参谋的教育培训，提升参谋的业务能力。1941年7月底，第五师成立参谋训练班，“计有参训学员42名、测绘学员30名、译训学员19名”^{[26]607}。1942年6月华中抗大总分校开学时，设有五个队，第四队为参谋科，“以培养团级司令部参谋为目的，现有学员五十六名，多现任参谋及文化水准较高的连、排干部”^{[26]970}。同时，“参考抗大教材、军部教导队教材和干校教材”^{[8]211}。新四军在参谋教育上还注重培养参谋工作者的共产党员修养和参谋工作修养^{[28]186}，提高参谋人员的个人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

明确参谋与首长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参谋的政治地位。“军队犹如人，首长是其头，参谋像是其脑，政治部是其血肉，军队是其手足”^{[8]206}。新四军还在制度上“确定参谋处工作是司令部工作的枢纽，参谋长是首长的代理人，对各部工作，在工作上处于领导地位”^{[28]241}。参谋是军队的“大脑”和首长“代理人”地位的确立，使参谋长成为司令部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扩大了参谋的职权，提高了参谋的政治地位。

在参谋工作方面，首长要尊重参谋的意见。在军队指挥方面，参谋可以“指导全部队，全部队应该服从他”，但不得直接下命令，“只能用通报，除首长指定指挥者在外”^{[8]209-215}。之后，新四军为了突出参谋的重要性，发挥参谋的“大脑”作用，明确规定“参谋是首长的代理人，部队的统帅者，各级指挥员应以服从首长服从上级的精神和态度去服从参谋长，各级首长对自己的参谋长应尊重及设法发挥其指挥能力”^{[29]161}，“如非原则问题，首长应大胆地让参谋去干，予以实际锻炼，不要过于干涉”^{[24]153}。不仅如此，新四军还要求将“团以上首长副职斟酌取消”^{[29]161}，进一步提升了参谋的政治地位和威信，推进了参谋工作的顺利开展。

此外，参谋在军队的管理上具有独立性。参谋“对于首长有其隶属性，绝对听首长的指挥；首长对他也有其依存性，他的生活一时一刻不能脱离与首长的联系，可是还有其独立性”^{[28]168}。参谋与首长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参谋工作是首长工作的一种分工。在首长因故无法直接管理军队时，“参谋长负直接管理机要领导之责任”^[30]。例如，1944年9月，彭雪枫不幸牺牲，新四军四师的指挥权就由参谋长张震暂时代理。参谋人员还有到部队巡视、检查工作的权力。参谋到部队检查工作时，“在具体情况下赋予代表首长的权利，部队指挥员应听其指挥”^{[28]169}，同时，参谋在检查工作后应“向该部队负责同志正确地提出意见及办法”^[31]。

参谋人员的重要性正如陈毅所说，“每一个团有几个好参谋，比多几个连还要好”^{[28]169}。尤其是参谋是军队的“大脑”和首长“代理人”地位的确立，使得参谋人员在协助首长管理军队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新四军在这一时期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参谋的政治地位和威望，提高了参谋人员的素质和业务能力。但是，整体而言，“参谋质量不强，因之工作虽见进步，

但所存缺点仍很多”^{[3]575}。

三、新四军参谋地位的确立(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

新四军对参谋的定位是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随着参谋制度的逐渐完善,参谋业务能力的提升,参谋在军中的政治地位和威信逐渐提升。参谋是首长“代理人”的确立,标志着参谋不再是军队首长的“幕僚”,而是形成了一荣俱荣、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到这一阶段,参谋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职能也有所增加,但是,参谋质量不强、轻视参谋等问题依然存在,亟待解决。

1943年2月,参谋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1)有个别首长仍然认为参谋工作是幕僚工作,参谋人员是私人雇员,因而任意指使或者个人包办一切,而不尊重参谋机关的职权;(2)一般干部不愿做参谋工作,把参谋工作看成单纯的技术工作和事务工作,轻视自己;(3)参谋工作人员一般能力薄弱,质量不高,没有经过比较长期的专门训练,文者过文,武者过武;(4)各级参谋机关对各个战术战斗的组织与指挥,不能起积极的领导作用,还缺少战役上的远见;(5)司令部内各种工作制度的建立不完善,人员编制也不充实,分工亦不严密^{[26]1012}。新四军参谋工作的整体进展不是很理想。到1944年时,“有的战略单位参谋处不健全,能力不强”^{[15]521}等问题仍然存在。参谋工作带来的压力,使赖传珠一度想辞去参谋长职务^{[15]455-456}。

新四军参谋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改善参谋的地位。为此,新四军在重建军部以后,“建立和调整了各级司令机关和军属各机关部门的组织与工作,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指挥系统”^{[25]253}。至1942年新四军召开华中扩大大会时,又重新调整了司令部的组织机构,“军设作战、通讯、侦察、管理、教育、人事、地武等七科,师不设地武科;军师称科,旅称股,团设参谋若干”^{[3]575}。至此,新四军参谋组织逐渐健全,日趋统一。

新四军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改变了参谋的处境,提高了参谋的政治地位和权威。与国民党将参谋定位为幕僚相比,新四军对参谋的定位是首长的“代理人”,“对各部工作,在工作上处于领导地位”^{[28]241}。新四军中参谋与首长是一种伙伴关系,参谋在与首长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具有统帅全军的权力,可以指导全军工作,全军必须服从参谋的领导。因此,新四军扩大了参谋的职权范围,使得参谋不仅可以管理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兼职”其他方面的工作。

参谋在职责上是“要参与工作、出谋划策,故在其工作范围来说,是要参赞军机(提出作战方案,研究上级意图并执行之)。参谋在管理、训练部队上,是各级指挥员最好的助手”^{[24]190}。参谋业务能力的提升,是新四军参谋工作顺利进行的保障。为了提高参谋的整体思想文化水平,对于新四军出版的《军事建设》,要求“营以上干部及参谋人员,均应按期详细阅读,其中关于战略战术问题的文章,应定期讨论并作深刻研究”。同时,加强参谋人员的政治和政策学习,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要求他们学习“中央历次对教育的决定和指示及毛主席、陈(毅)军长对教育的论文”^{[25]274}。不仅如此,新四军还“把好的军政干部有计划地调充到参谋部门去”^{[24]229},以此来提高参谋人员的素质,推动参谋工作的发展。

参谋人员的职权,随着时局的变化及参谋工作的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逐渐扩大。在职权范围内,参谋可以“组织指挥、管理、教育主力部队,但同时也要组织、指挥、教育地方武装,同时又要组织、管理、指挥、教育武装群众”^{[11]303-304}。也就是说,有关军队管理的工作,参谋都有权力参与和指导。例如,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经办的工作,“不仅有军事斗争,还有部队编制、干部教育、各部队的经费管理等事项”^{[25]53}。因此,参谋的职权得到扩大,可以管理有关军队作战、军事指挥、军队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在职权范围外,参谋处与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兵站各部在工作上平行的关系,原则上相互配合,并且“以上各处是由参谋长直接领导”,“参谋处长(作战科科长)有指导各处之权”^{[8]87-88}。此外,参谋还有“兼职”工作,例如,参谋长可以兼后勤部工作^{[3]577},有时

参谋还需要“协助军司令部搜集敌伪报纸书刊,协助卫生部门采购西药(奎宁、痘苗等),协助供给部门采购军用物资(电池、布匹,军工原料如铜皮等),接送去敌区的干部与敌方投诚人员等”^[32]。

参谋职权的扩大,使得参谋成为军队的“全能手”,成为新四军的“大管家”。参谋“大管家”地位的确立,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地位与信仰”的要求。在军队内,“兵团首长特别是某些军、师首长对参工的重视亦较前为好,过去普遍轻视参工的缺点已趋改变”,“由参谋长个人的能力与信仰已开始推广到对参谋工作组织的信仰”^{[31]575-576}。而且,参谋人员威信和政治地位的提升,使得新四军参谋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下级部门给首长的报告,除写有‘亲启’的,其他都可由参谋代拆代办,直接处理,只要在交班时将处理结果向首长和参谋长汇报即可”^[33]。这样一来,“过去不用首长的名义办不成事,现在以参谋处的名义写信、发通知,部队照办不误”^[34]。

参谋地位的变化是新四军参谋制度完善的主要标志,推动了新四军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党的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参谋与首长之间建立了和谐的“伙伴”关系,二者相互配合,使新四军逐渐成长为一支正规化的部队。新四军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确立参谋是首长的“代理人”,提高了参谋的政治地位,有效地发挥了参谋的作用,使参谋成为首长的“好帮手”和军队的“大管家”,推动了新四军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也是新四军生存和发展能力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 [1] 肖晓飞.走向正规化:新四军参谋工作初探[J].中共党史研究,2019(9):100-111.
- [2] 叶铭.简析抗战时期中央军委参谋部门的军事职能与作用[J].抗日战争研究,2020(3):22-36.
-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5[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综述[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14-15.
- [5] 田玄.中国现代军事制度研究:以中华民国军事制度为主线的考察(1924—1949)[M].北京:中华书局,2020:168.
- [6] 张瑞德.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81-192.
- [7] 《湖北文史资料》编辑部.湖北文史资料:第3辑[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1:139.
- [8] 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张云逸军事文选[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 [9] 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98.
- [10] 安徽省档案馆,安徽省博物馆.抗日战争史料选:新四军在皖南(1938—1941)[M].河南省固始县印刷厂,1985:99.
- [11] 军事科学院《项英军事文选》编辑组.项英军事文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 [12] 《粟裕军事文集》编辑组.粟裕军事文集[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41.
- [13]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58.
- [14] 彭雪枫.彭雪枫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 [15] 沈阳军区《赖传珠日记》整理编辑领导小组.赖传珠日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回忆史料:1[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185.
- [17] 安徽省军区政治部.新四军在安徽[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66.
- [18] 王辅一,张学亮.周子昆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120.
-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497.
- [20] 《赖传珠将军日记》编辑小组.赖传珠将军日记[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245.
- [2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2.

- [22] 马洪武,等.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4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47.
- [23] 开荆.论参谋工作[J].奋斗,1942(2):16-21.
- [24] 张震.张震军事文选:上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 [25] 赖小鹏.文韬武略开国上将:赖传珠纪念文集[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
- [2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3[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2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28] 陈毅.陈毅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1996.
- [29]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中共中央华中局[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 [3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总参谋部·文献:2[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458.
- [31] 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册[M].滁州报社印刷厂,1985:170.
- [32] 黄玉生,等.战地旌旗红:新四军黄花塘军部研究[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3:170.
- [33] 晁帅.新四军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17-27.
- [34]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中原分会,等.纪念刘少卿文集[M].襄樊市教育印刷厂,2003:14.

On the Position of Staff Officer in the New Fourth Arm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XUAN Yanqi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6, 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osition of staff officer in the New Fourth Army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main requisite of the regular Army.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ew Fourth Army, the low rank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ism of the staff officer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ir lag-behind ideological quality and imperfect staff officer system of the Arm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osition of the staff officer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consulting role, the Army has adopted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aff officers throughout the army,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staff officers. These measures have gradually strengthened their function and power, making them the all-rounder, and actually the chief in the army, who had become the partner and agent of the head. These measures had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staff officers, facilitated efficient work, accelerated the regularization of the army, and improved the viability of the New Fourth Army.

Key words: the New Fourth Army; staff officer system; position of staff officer; Lai Chuan-zhu

〔责任编辑:朱 根〕